

巴金与浙江文学：

文心相照，湖山为证

■ 郑绩

2025年是巴金逝世二十周年，在这一特殊节点重新梳理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联，既是对文学巨匠的缅怀，有助于深化对现代文学地域互动机制的理解，也能为当代文学传承经典、回应时代提供启示。

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系，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神互动史。从地域根系的建立到文人社群的形成，从创作理念的相互影响到精神遗产的当代传承，二者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丰富了巴金自身的文学世界，塑造了浙江现代文学的精神特质，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深层浸润：地域归属感内化为创作精神

巴金与浙江的文学羁绊，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往来，形成了地域根系与文学场域相互滋养的深层关联。这种地域归属感并非静态的身份标签，而是通过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西湖漫游、文人交游与文学实践，逐渐内化为其创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到西湖在巴金文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学者李存光在《巴金传》中详细梳理了1930年代至1960年代巴金数十次杭州之行的文献记录，指出西湖不仅是其逃避都市喧嚣的休憩之地，更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巴金全集》中数十篇散文与书信提及西湖景致，从断桥残雪到九溪十八涧，自然山水不再是单纯的背景铺垫，而成为情感载体与精神象征。在与萧珊的七年西湖闲游中，湖山景致与爱情记忆交织，形成《怀念萧珊》等作品中见景怀人的独特叙事模式，这种将私人情感嵌入地域空间的书写方式，被学者王瑶称为“巴金式的地域抒情传统”。

浙江文学场域对巴金创作的塑造同样显著。民国时期的杭州作为东南文化重镇，汇聚了马叙伦、陈叔通、黄源等大批文人学者，江南文学会馆所在的北山路文化街区，更是形成了密集的文人交流网络。以西湖为中心的文人社群互动，为巴金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对话语境，其民主主义文学理念与浙江文人的启蒙追求形成共振，推动了左翼文学在东南地区的传播。



巴金手书“西湖在我心中”。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文学的地域特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巴金的创作风格。相较于川派文学的激昂澎湃，浙江文学自古便有冲淡平和的审美传统。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巴金后期作品中日益增强的克制与温润，与西湖山水的熏陶及浙江文人的影响密切相关。从早期《灭亡》的激情呐喊到晚年《随想录》的沉静反思，这种风格转变在其与方令孺、黄源等浙江友人的交往书信中可清晰窥见，地域文化的浸润成为其文学成熟的重要助力。

文人交游：构建文人共同体，推动世界经典传播

杭州自古以来便是文人交游的重要场所，巴金在浙江的交游活动以文会友，构建起文人共同体，成为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1923年，时名李尧棠的巴金自成都赴上海途中，首次返回祖籍浙江嘉兴祭祖，停留约十日。期间走访破败的李家祠堂，接触嘉兴本地文人，听闻家族旧事与地方掌故，此行为其后来作品中寻根意识埋下伏笔，也是其与浙江地域文化的首次深度联结。

1929年，巴金在上海与黄源相识，彻夜讨论鲁迅作品的传播与左翼文学的发展方向，二人交往持续半个多世纪，合作出版过《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录》。

1935年，巴金在九溪十八涧与陆

蠡、丽尼、黎烈文同游。几人沿溪而行时约定共同分工翻译屠格涅夫作品，形成以翻译为载体的文化协作。

1937年巴金与师陀、卞之琳等人在天香楼的聚会，不仅留下了“十年之约”的文坛佳话，更直接促成了屠格涅夫译作的分工计划，推动左翼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的传播。

1942年，陆蠡因营救战友被日军杀害，巴金在杭州与黄源、方令孺等人秘密举办小型追思会，追忆陆蠡的文学理想与人格气节。巴金在会上承诺要将陆蠡的故事写进作品，后在《怀陆圣泉》中详细记录此次追思场景，成为纪念陆蠡的重要文献。1960年代，巴金、萧珊与方令孺经常在杭州会面，相互慰藉，交流创作与读书心得，方令孺将自己的旧体诗手稿交巴金保存，巴金则为其修改散文初稿。方令孺总是去城站接巴金夫妻，过几天，又在城站的月台上与他们挥别。巴金与友人们患难持守，以精神互相守望，浙江文人社群成为巴金精神支撑的重要力量。

现在，巴金的手模和塑像一直留在北山路上的江南文学会馆内，正是这段精神传承史的物质印记。

持续共振：“讲真话”理念的当代延续

进入当代语境，巴金与浙江文学的关联并未随时间褪色，反而通过文学遗产的活化与精神的传承，形成了与当代

浙江文学的持续共振。

江南文学会馆、巴金亭等物理空间的存在，成为文学记忆的物质载体，而巴金留下的精神遗产，则通过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得以延续与发展。

巴金“讲真话”的文学理念在当代浙江作家笔下得到鲜明延续与创新演绎。余华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以冷静克制的笔触书写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困境，直面人性本质与生命真相，这种对真实的执着探索，与巴金《随想录》中直面历史、批判现实的“真话精神”一脉相承。麦家在《暗算》《风声》等作品中，通过谍战题材的独特叙事，挖掘特殊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坚守，延续了巴金将个人命运与公共历史相结合的写作传统。此外，浙江文坛近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潮流中，《塘栖》《故园》等作品对地域历史与民间记忆的挖掘，同样是巴金“以个人经验映照时代”创作理念的当代实践。

巴金与浙江文人构建的“以文会友、互助担当”的社群精神，在当代浙江文学界仍具鲜活生命力。浙江省作家协会持续推动“西湖文学沙龙”“浙江青年作家研修计划”等活动，延续了当年巴金与友人的交流传统，为青年作家提供创作指导与交流平台。当代浙江作家群体普遍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如艾伟在作品中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精神困境，哲贵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人性博弈，均体现了巴金等前辈文人“文学为人生”的责任意识，彰显了文学社群精神的当代传承。

文学遗产的活化利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的重要纽带。浙江通过巴金主题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整理了部分巴金与浙江文人的往来书信、未刊手稿等文献，为当代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由巴金故居与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图书馆开幕，展览通过45幅图文版面、6幅画家作品及鲁迅手稿、巴金藏书实物展品，展示鲁迅与巴金的精神传承。展览开幕式上，杭师大话剧社的同学还演出了精心排演的巴金诗剧。这些举措不仅深化了对巴金与浙江文学关系的认知，更让年轻一代读者感受到经典文学的生命力。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格律是镣铐，还是诗意的羽翼

■ 文韵平

近年来，古典诗词频频引发关注，《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诗词类综艺节目热播，吸引了一众拥趸。不久前，绍兴举办“放翁杯”诗词大赛，天南海北的人发来参赛作品：传统格律诗词。近日，大赛获奖作品公布……这都让我们真切看到，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追捧。

随着传统格律诗词升温，多元化的观点频频碰撞。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四派：反对派，认为应淘汰格律诗词；保守派，认同经典格律诗词的鉴赏价值，但对其当代创作持怀疑态度；复古派，强调创作严格遵循古韵、古法；创新派，主张在遵守基本格律的前提下引入新题材、新思想、新语言。

先表明立场，笔者赞同创新派。有关注、有热度、有碰撞是好事，能促使我们更深入思考：格律诗词到底有啥魅力？应怎样用好这丰厚的文化瑰宝？

老古董过时了吗

格律，即格式、音律，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形式规范体系，涵盖平仄、押韵、对仗等要求。

格律诗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随着白话文兴起，格律诗词如今已逐渐淡出日常写作。故此，反对派视其为“老古董”，主张将其淘汰。

格律诗词虽已不是“主角”，但只要有人人在，它就不会消亡。作为文学星河中璀璨的明珠，其艺术魅力至少体现为几个方面——

统一齐整。每篇诗、词，字数都有严格限定，例如七言律诗每句7个字，共8句56字。词也称长短句，虽语句长短不一，但每个词牌的形式基本统一。

韵律优美。格律诗词平仄交替、押韵回环，且具有鲜明的节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正是平仄交替的二三字节奏，“流”“楼”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唇齿生香。

对仗工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毛泽东《答友人》）类似这样字数相同、平仄相对、词类相对的形式，营造出令人赏心悦目的对称美。

意境深远。要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中表达丰沛的情感，须言有尽而意无穷。黄景仁《绮怀》便是一例：“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露立中宵。”一怀愁绪，几多感慨，尽付短短数句中。

试问：要淘汰这样的珍宝，岂非“愚卖爷田心不痛”？

为啥要遵循格律

反对派主张淘汰格律诗词，还有一个理由：格律是创作的束缚。

这种观点并非全错，格律的确不易掌握，但不能因为存在难度就否定。在一定之规下创作格律诗词，是“戴着镣铐跳舞”。纵然如此，在创作时，有些规则仍应坚守：例如诗词的句数、字数、平仄、押韵的位置，对仗的要求……

为什么有些规则不宜打破？并非刻板、守旧。在格律诗词长期发展过程中，前人发现一定规律并逐步将其固定下来，形成益于提升品位的“黄金定律”，例如平仄交替、讲究粘对。

平仄交替、粘、对，通过长短、高低音的规律性循环，营造出抑扬顿挫的效果。遵守基本格律并非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毛主席诗词、王国维诗词、叶嘉莹诗词不就是明证吗？再往近处看，绍兴此次诗词大赛的获奖作品中也不乏佳作。有的感怀陆游：“徙存早岁胸中气，消释平生梦里冰。”有的描绘水乡：“一棹云霞入画屏，乌篷摇乱满天星。”……

既然眼前就不乏佳作，那么，保守派对格律诗词当代创作的怀疑，就大可放下了。

今日新路怎么走

如果说反对派是个极端，那么，复古派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严格遵循古法，唯古独尊，未免有些食古不化。

语言一直在发展变化，格律诗词创作为啥不能随之而变？

例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杜牧《山行》）唐朝时，“斜”读作xiá（s读浊音），和“家”押韵，今天看起来已不那么和谐。又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别”在现代汉语中是平声字，和上句的“时”字似乎失对，但“别”在唐朝是入声字……

创作时，我们尽可按现代汉语的平仄和音韵，但也应对自古以来变化的有所了解。

相对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精神内核应在传承中创新，借助格律诗词这个“旧瓶”，装入新时代生活的“新酒”。

提及创新，就难以绕开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如今，只要输入指令，AI就能瞬间生成合乎格律的诗词。“创作”如此便捷，“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似乎已无必要。但AI“创作”更多是词汇堆砌、格律填空，少了温度和情怀和积淀，总有点机器的冰冷感。

借助AI做一些辅助工作并非不可，但真正的创作没有捷径可走，还是要学习、积累、感悟……这正是叶嘉莹先生说的“兴发感动”。而这种质素，与我们的心性、品格、学养、经历，有密切关系。

“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袁枚的诗句道出了创作的艰辛。今天，我们依然应秉承这样的态度，对优秀传统文化热爱而敬畏，在传承、发展中再创高峰。

（执笔 李建）

《三滴血》：黑色寓言中的罪与赎

■ 刘强

由康博执导，胡歌、文淇主演的《三滴血》无疑是2025年末中国影坛一部值得品读的作者电影。影片以“一滴寻亲，一滴赎罪，一滴绝杀”的冷峻命题，将镜头对准东北边境家族式人口贩卖的隐秘链条，讲述刑满释放的朱邵玉（绰号：驯鹿）为寻子深入犯罪团伙内部的救赎之路。该片以其冷峻的影像语言和深刻的人性叩问，在银幕上构建了一个关于罪与罚的现代寓言，也完成了一次黑色电影美学的本土化实践。

黑色美学的在地化实践

黑色电影是20世纪40-50年代兴起于好莱坞的电影风格，以犯罪、悬疑为核心载体，视觉上以低光阴影、黑白高对比度、潮湿街道与昏暗室内为标志性意象，多刻画失意侦探、蛇蝎美人等边缘角色，有着强烈的悬疑吸引力，是电影史上风格鲜明、兼具思想深度与观赏价值的类型。其并非呈现黑暗本身，而是借由这份幽暗底色，审视人性的多面。进入21世纪后，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电影产业环境中，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在地化”转型，从单纯的类型模仿，演变为批判现实、刻画时代焦虑的重要作者性表达，涌现出了《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烈日灼心》《涉过愤怒的海》《坚如磐石》等一批优质电影。

康博执导的《三滴血》延续了这类电影的美学传统，并将其成功本土化。在历时五年的调研中，康博敏锐地捕捉到21世纪初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影片中那些低照度摄影、高反差影调、倾斜构图等表现主义手法，与荒寒景观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张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修辞。茫茫雪原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成为道德荒原的绝妙隐喻。摄影师范超将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惨白日光转化为叙事元素，人物在广袤冰原上的渺小身影，成为命运无常的视觉隐喻。

人物塑造上，胡歌饰演的驯鹿突破了传统黑色电影中硬汉侦探的单一形



象，呈现出道德层面的复杂肌理。他既保留了温顺善良的本性，又具备极地生存的坚韧；宋佳饰演的貂儿集美丽与危险于一身；文淇饰演的李棋打破了传统被动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从被利用的棋子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母亲；而闫妮饰演的老姨则颠覆了犯罪头目的常规塑造，其接生婆与犯罪首脑的双重身份，让这个角色充满了道德悖论。这种身份与性格的复杂性恰如黑色电影理论家詹姆斯·纳雷摩尔所言：“黑色电影的魅力在于其道德模糊性。”而每一角色动物化绰号命名策略不仅暗合黑色电影中人性异化的主题，更巧妙地揭示出在罪恶的生态链中，每个人都不可能避免地沦为猎食者或猎物的命运。

留白艺术与影像诗学

影片有意淡化情节的戏剧性，转而通过大量的留白和意象营造情感张力。那些被省略的人物前史、被刻意模糊的行为动机，反而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范起的摄影机善于捕捉细节的震撼力——床头烟头烫出的麻将图案、冰棍（高子淇饰演）只吃密封食物的习惯、变形金刚玩具的断臂，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

却成为解读人物命运的关键密码。

声音设计同样参与叙事。影片中呼啸的风声、雪地的脚步声、老式火车的轰鸣，共同编织出一张声音的网，将观众牢牢笼罩在那种无处可逃的压抑氛围中。而当李棋在生产过程中的惨叫与人贩子打牌的喧闹形成对位时，声音的对比产生了惊人的批判力量。

叙事断裂与风格失衡

然而，《三滴血》也存在明显缺陷。多线叙事的结构导致情节衔接生硬，人物动机转变缺乏足够铺垫。如朱邵玉出在罪恶的生态链中，每个人都不可能避免地沦为猎食者或猎物的命运。情感共鸣屡受挫。

同时影片也暴露出康博导演在类型融合上的青涩。黑色电影作为一种“情绪”和“风格”，其成功关键在于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三滴血》中那些刻意模仿《冰血暴》《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桥段，虽视觉效果出众，却未能完全融入叙事本体，形成了个别“为风格而风



《三滴血》剧照

格”的突兀段落。

艺术电影的困境与突围

《三滴血》的市场遇冷，折射出高度风格化艺术电影的生存困境。在短视频泛滥、观影习惯快餐化的时代，那些需要细品的形式语言和复杂人性描写，难以在短时间内征服观众。

然而，艺术电影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对主流叙事的超越，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对现实的多维度观照。正如黑色电影的本质并非对黑暗的沉溺，而是透过黑暗审视人性的复杂维度。《三滴血》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呈现，对“家”的传理理念解构，都是值得肯定的尝试。黑色电影的未来，需要创作者在深耕本土文化土壤同时，还需借鉴类型片叙事智慧，在叙事技巧上精益求精，同时在主题挖掘上贴近当下的精神困境；在保持作者风格的同时，增强故事的可看性，以求在作者表达与观众接受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正如黑色电影大师罗伯特·布列松所言：“电影不是讲故事，而是用故事来建构。”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硕导）

读者投稿

心灵的原乡，也是创作的起点

——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

■ 袁跃兴

近日，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在央视纪录频道完成首播。该纪录片以地域视角解读文学创作，延续了第一季探寻文学原乡的基本主题，跟随韩少功、张炜、叶兆言、翟永明、刘亮程、莫言重返故乡，探寻他们的创作历程与精神原乡的内在联结，揭示“生活的故乡”如何升华为“文学的故乡”。

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关于作家的生活和故乡的纪录片？该片导演表示，我们用镜头回溯作家在家乡的童年与成长，如何影响他们创造出迷人的文学版图，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特征，要拍出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韩少功寻根小说《爸爸爸》中丙崽的原型是当年的邻居；刘亮程走进新疆沙湾当年的地窝子，其实他敏锐的声音描写，例如“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窸窸窣窣”便是他真实的儿时经验；叶兆言带着观众穿行于江苏南京一个老旧小区，他的小说《璩家花园》里的人物璩

微评

画个祥云就是国风了？

“国风”成为平面设计、动漫争相贴上的标签，但不少作品仅停留在符号的粗率堆砌——图案必用祥云，背景必有松树、高山。创作者忽略了中式美学的内核在于意境与气韵，而非元素的简单叠加。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暴露了创作上的懈怠，最终呈现的只是空洞的“国风”外壳。

——河南省周口市读者@周泉

明星出书别自嗨

眼下明星出书潮高涨，然而很多是自嗨式创作。陈冲的《猫鱼》获奖证明其实力，但其他很多作品内容注水，消耗了大量文化资源。出版机构若继续奉行“流量至上”，纵容粗制滥造的书籍出版，终将反噬行业公信力。书的价值在文字和思想的重量，不在作者光环。

——山西省长治市读者@周慧虹